

清代奏谕与翻译史研究：史料、史识与史观

——朱灵慧教授访谈录

鲜于乐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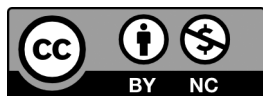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摘要 | 朱灵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先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比利时鲁汶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交流学习，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翻译史及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已在《中国翻译》《四川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华中学术》等中文核心期刊，《The Journal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等SSCI收录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先后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本次访谈中，朱教授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译事奏谕与翻译政策研究》，针对翻译史研究的史料、史识与史观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关键词 | 翻译史研究；清代奏谕；史料；史识；史观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鲜于乐洋（以下简称鲜于）：朱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访谈。您在2019年7月获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译事奏谕与翻译政策研究》，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该项目吗？

朱灵慧（以下简称朱）：《清代译事奏谕与翻译政策研究》主要以清代，即1644—1911年的翻译事务奏折上谕为史料，以语言接触为主线，综理清廷在民族融合和外洋事务中的语言问题、翻译情状和实际政策，即在民族态度和外交态度转变中清廷的翻译政策衍变，以及充斥其间的新旧思想、君臣思想、中西思想之沟通、碰撞、妥协与冥合，爬梳清廷在由被动到主动，由自信到自省的民族态度

和外交态度转变中，贯穿始终的翻译政策衍变。

鲜于：该选题将奏折与翻译相结合，而且是在“中国历史”学科中立项，非常新颖，能分享一下您当时是如何想到这个选题的吗？

朱：我首先关注到的是奏折上谕这一特殊的文本形式。经过相关研究梳理，我发现奏折上谕一直都是清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政策研究可利用的重要史料。一方面，奏折上谕作为清代重要的官方文书，大量收录于各种档案文献，如《大清历朝实录》《钦定大清会典》《筹办夷务始末》《历代宝案》等各种档案史料集，可谓卷帙浩繁。另一方面，奏折上谕之史料学价值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清代

奏折制度》《中国谏议制度史》《清代谏议制度研究》等著述则从奏折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谏言方式角度,综理了其制度演变;又有《清史史料学》《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史料和历史科学》《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等著述明确提出奏折上谕的史料价值。但是,奏折上谕研究目前仅限于史学界,在翻译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鲜少受到关注。既然自古以来便有中外语言接触,那么作为朝廷事务之一,在清代奏折谕旨中必然有所记录,并一定涉及翻译问题。带着这一设想和已有的部分资料,我开始广泛浏览清代档案史料,最终也验证了这一推测,从而确定了选题的可行性。对于史学界来说,从翻译切入,无疑是崭新的视角;对于翻译研究而言,以奏折谕旨为研究对象,材料选取较为新颖。

鲜于:在这个选题中,您具体关注的主要是哪些翻译问题呢?

朱:事实上,清代的历史特性导致其翻译问题错综复杂。整体而言涉及两大方面。一是民族翻译问题。清代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1644年,多尔衮率领清兵入关后,满汉翻译问题尤为突出。总体而言,清代满汉翻译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入关前满汉翻译政策渐成: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创书房,设六部,置巴克什、启心郎、笔贴式三类译员,吸纳兼通满汉之儒臣翻译汉文政治和军事书籍;王文奎、宁完我等上奏提议翻译汉文经史;开科取士,培养译才等,涉及人员选拔、翻译选材等。二是清前期满汉翻译政策兴盛:顺治朝推出翻译科考试,设八旗官学;雍正朝恢复八旗翻译乡会试;乾隆朝推行“清语骑射”政策,坚持政府公文满汉合璧制。三是清中期满汉翻译政策式微:随着满汉官员语言障碍消除,先后裁除宗人府外其余部院启心郎、通事等职,仅留笔贴式,并最终在满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逐渐消失。另一个则是中外翻译问题。现有翻译研究大多聚焦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初的翻译高潮,但事实上清廷翻译事务从未间断,且频现于奏折上谕档案记录中。一方面在开海贸易、贡使来朝、“难夷”遣返、教案处理、鸦片走私、兵船来犯、西学译入、机构设立、派员留学等各项事务中,中外语言接触极为频繁;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国别日渐增多,语言水平参差不齐,故“言语不通”之困境愈加凸显,清廷翻译意识日趋增强。将清代作为一个整体研察,可见清廷面临的翻译困

境、举措,以及其中映射的主权意识、外交观念等等。除此之外,翻译问题还与教育制度演变交织。清廷有识之士奏请译事,多感于翻译人才匮乏,情势窘迫,扭转时局之必须,故译事与翻译人才培养紧密关联,意即是早期教育思想,尤其翻译教育思想的雏形和缩影,其中对外语人才选拔途径、培养课程及模式、教习资质及薪酬官衔,至学习期满提拔任用均有详细陈述。故结合清代当时的背景,考察翻译人才培养的初衷、路径、成效,以及当代启示。当然,翻译史研究的本质是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揭示其中的社会问题,如清代中外思想、新旧思想、君臣思想的冲突与碰撞,考察整体的翻译政策形成和演变。

鲜于:这样看来,奏折的确具备不小的翻译研究价值,但历史长河浩瀚烟渺,请问应当如何挖掘翻译史研究的切入角度?史料又该如何选择呢?

朱:翻译研究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因此翻译史研究既可关注既往的翻译实践,如何人何时译了什么,也可关注既往的翻译事件,如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实情与实效。前者可以从某典籍作品、文学作品、科技作品等入手,例如刘孔喜和许明武以王阳明心学代表作《传习录》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传习录》的百年英译史,即1916年美国哲学与心理学教授传教士亨克(Frederick G Henke)译本,及1963年美籍华裔哲学史家、汉学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本,讨论了两英译本出现前后西方学者对阳明心学的关注与研究情况变化,从而进一步探讨了《传习录》英译对推进阳明心学西传的作用。再如,迟帅和许明武以纪实文献《瀛涯胜览》为研究对象,从历时角度梳理了菲利普斯(Geo Phillips)的节译本和米尔斯(Mills J V G)的全译单行本的英译史,讨论了两个译本在传播与传承丝路文明中的作用。此类对过往翻译实践的系统研究目前较多,涉及不同译者身份,以及各类文本题材。关注历史中的翻译事件,即从如清代、民国等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情状入手,如王宏志教授研究了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外相巴麦尊向清廷发出的照会翻译中所出现的两个问题,并分析了问题成因,突显了翻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外还研究了马儒翰在《南京条约》中的翻译问题,论证了马儒翰将“领事”一词翻译为Superintendent并非误译,而是由于当时的中英外交环境所致,等等。

鲜于：关于奏折中的清代翻译事务，可以略举一例吗？

朱：那我以《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一文为例，谈一谈清代的翻译事务。在整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时，我发现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里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四省海关，开海贸易，对外交流频繁，“夷务”奏报与日俱增。“夷人”凡遇自然灾害须入清者，则要按例上报，循例抚恤。其中定然涉及与“夷人”的语言交换问题，“译讯”便是清代处理“夷务”的程序之一，即“翻译讯问”。那末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是如何“译”的呢？

“讯”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经过研究发现，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随着“夷务”的日益繁杂，清廷的防范也逐步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译”的紧迫性，为晚清的翻译高潮打下了基础。

鲜于：翻译史研究的一大难点是从庞杂的史料和语料中发现研究问题，请问研究问题应当如何确定呢？

朱：事实上，这就是如何从史料中形成史识。史才、史学、史识为“史家三长”，后梁启超加上史德，统称为“史家四长”。“史识”指学者如何认识历史，解读历史。既然是翻译史研究，就应当具备翻译研究的相应史识，将相关研究放置于翻译的背景之中。其次，则是历史认识，即结合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研察翻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衍变。宏观和微观是时空概念，其范围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换言之，就是观察其中的动态变化，不仅要关注翻译事件中的“大人物”“大历史”，亦须聚焦于铺垫、引发、促成相关事件的“小人物”“小历史”。例如研究清廷翻译事务、翻译认识、翻译观念的变化等。

鲜于：可就这一问题略举一例吗？

朱：以《官智渐开：光绪、宣统朝之译务与译识》这篇文章为例，便是以《清季外交史料》相关档案为史料的个案研究，探究了清末光绪、宣统两朝的翻译事务、翻译情状，以及翻译意识。《清季外交史料》中，翻译事务大致可归纳为五类：文书翻译、约章翻译、界务翻译、律例翻译和书报翻译，

如果说前三类翻译是清廷被迫与外洋各国斡旋的无奈之举，那么律例翻译和书报翻译则初步突显了清廷求强求变的意识。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外约章和文书遇有歧义时，虽然清廷曾试图争取话语权，但西方殖民者话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中外语言问题，清廷逐步警惕慎重。在国力衰微、译员不足的逆境下，清廷逐渐意识到了语言和翻译的重要性，提出了诸多裨益时局的观点和细则。一方面，通过反复核对、详校译文等方式以确保权益；另一方面，在华报译出、译员选派、开启民智等方面逐渐采取主动措施。官智渐开，民智渐启，清末翻译高潮是以筹防心态到求强求变的转变为铺垫的。由此将被动与主动、困境与举措结合，既关注翻译史上的“高尺”，亦关注低谷，辩证发展地分析历史问题。

鲜于：翻译史研究尽管是从翻译视角切入，但其本质依然是史学研究，对此，相关研究尤其需注意什么问题？

朱：大量充足的史料、言之有据的分析是翻译史展开的基础，但正确的史观是相关研究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在研究过程中，避免主观性干扰是每个历史研究学者都应当遵循的准则。例如，本项目以《大清历朝实录》《钦定大清会典》《筹办夷务始末》《历代宝案》等各档案史料集为研究史料，坚持以文献为本，论据结合，避免做出空泛的理论假设，力求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紧密结合晚清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探索翻译政策的实施原因与成效。同时，要坚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历史事件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当它符合社会发展必然性时，便是合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性逐渐不再符合当下社会，它便逐渐变得不再合理。所以我们应当以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眼光看待历史。就像王宏志在其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因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法，违背了当时的意译风尚，受到了当时译者和读者的批判，最终在市场上走向了失败，但在如今看来，这却是新一代翻译家对于译论的思考，是进取的表现。

鲜于：史学研究的难点不仅在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更棘手的是史料的分析和阐发。拿到史料，

我们应如何有效展开研究呢？

朱：这个问题一语中的，道出了史料与史识的关系。在史料的整理中，同样需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否则再多的史料也只是堆砌。“让史料说话”并不是简单列举史料，而是尊重史料中的史实。就翻译史研究而言，可以围绕特定对象如译者、翻译机构，或者聚焦特定主题，如“难夷”事务中的“译讯”，也可关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等。随后的史识形成一方面可从翻译学科出发，研察所涉研究对象在翻译史或翻译学科中的地位 and 状况，另一方面是将相关翻译活动视作一个事件置入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具体而言，比如在社会转型、知识传递中的作用等。事实上，史学研究需要大量的文史哲知识积累，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也有助于多维视角的融通。

鲜于：如何确定有价值的研究选题一直是困扰研究生的一大难题，您能分享一些方法吗？

朱：这确实是科研工作中的一大难点，对此我有三方面的建议可供参考。首先，可以利用新知识去解读旧题材，从而获得新的认知和理解。可以是材料上的“新”，以本项目为例，同样是研究翻译政策，但本项目的研究材料是史料中奏折上谕这一特殊的文本形式，该类材料的研究价值在史学界中一直备受重视，但鲜有人研究其中的翻译政策，自然让人耳目一新，当然也可以是视角上的“新”。还可以是观点上的“新”，能够从旧材料中解读出新看法，但这比较考验同学们的思辨能力，需要加

强日常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其次，可以通过大量阅读文献，持续关注目前的研究现状，在阅读中思考，从中发现当下较为关注且有价值的选题。读到一篇感兴趣的文献时，可以同时阅读该文献中的参考文献、其中提及的原始文献、该选题相关的其他文献以及综述类文献等，加深我们对该问题的了解。还应当注意的是，在阅读时我们要带入自己的思考，带着问题阅读，不断在阅读过程中问自己“是什么”“为什么”，以及“还有什么”，从而慢慢搜寻有价值、有新意的研究问题。最后，还可以从文献综述中推陈出新。首先，可以对文献进行补充研究，丰富研究视角，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也可以采取同样的视角，丰富研究材料。其次，可以对文献进行深化和系统研究，例如我发表的关于民间文学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对于清末民初来华西人关于中国民间文学译介的介绍，另一篇则是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探讨其中蕴含的文学观与民俗观。此外，还可以进行例证研究，如对已有研究中观点的具体个案研究。其四，也可以对文献观点进行商榷争鸣，发表不同的见解。

鲜于：非常感谢朱教授的分享。此次访谈不仅了解到如何选择翻译史研究的角度、问题，以及值得注意的相关问题，还学到了确定选题的方法，受益匪浅。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跨空间、跨文化的活动，涉及问题包罗万象，纵横交错。作为翻译研究者，我们需要进行广泛地学习和积累，才能有所收获。再次感谢您！

Memorials and Edict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Historical Archives,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u Linghui

Xianyu Ley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Zhu Linghui, Professor 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Doctor of Literature, Master supervisor, has been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nd a visiting professor in Translation Center of KU Leuven in Belgium.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inly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also intercultural studies. She has published about 10 academic papers on such influential Chinese journals a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entral China Academics*, and also on foreign journals including *The Journal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Prof. Zhu has successively finished two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s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is now undertaking one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In this interview, Prof. Zhu illustrates in details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then go to historical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her project “Memorials and Edicts abou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Policy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history; Memorials and edicts in the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archives;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